

● 元典文化丛书 ●

诸经总龟

《春秋》与中国文化

涂文学
周德钧 著



李振宏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诸经总龟

《春秋》与中国文化

涂文学 周德钧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元典文化丛书

诸经总龟

ZHU JING ZONG GUI

——《春秋》与中国文化

涂文学 周德钧 著

责任编辑 陈广胜

责任校对 王 琪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125 字数:295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精装 27.00元
平装 22.00元

ISBN 7-81041-513-1/K·224

序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为“文化元典”^①。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

^① 关于“文化元典”的界说,详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

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代。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经历着深刻的变迁,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观念、历史意识、宗教神学、文化科学等,也都以成熟的形态凝聚、荟萃,涌现出一批文化元典,从而为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义域广阔的开放性基础。这些文化元典,诸如《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子》等,包含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各种文化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及其文化性质和特征。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面貌,中国国民性格之所以显示出大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独特的历史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是受惠于这批文化元典的历史奠基。

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

前提,同时也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和清洗,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义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惟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惟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大概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清理,从80年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选题。

研究和清理民族文化传统,自然应将目光投向奠定了民族文化传统基础的文化元典,它们之中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这一点,似乎不少文化学者都注意到了,因此,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文化元典的通俗读本,白话、译作蔚为一时之盛。然而,民族文化的清理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通俗性的讲解和翻译,只是一个最必要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去深入挖掘诸文化元典的内在义蕴,特别是这些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也都需要理个清楚;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做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批判。但这种从历史角度考察文化元典的作用,进行文化精神寻根探源的艰巨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过。文化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我们选择了编撰“元典文化丛书”这个课题,并为丛书确定了这样的宗旨:揭示文化元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方

位历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创制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义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的典籍并不很多。然而,从民族文化整体去考察,有蕴涵其整体精神的元典之作,如传统的“五经”、“四书”即是;而就某一种文化领域来说,又有该领域的创始之作,如兵学有宝典《孙子兵法》,医学有首创之作《黄帝内经》,神话之源《山海经》,算学之宗《九章算术》,史学的范型《史记》等等。这种某一文化领域的创始作,自然也应填于元典之列。这样,我们这套丛书初选了部分文化元典,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以期从一个新的基点上重新认识古代典籍的文化价值。

揭示文化元典的深刻内涵,并着重阐述其全方位的历史影响,并非易事,要有较深的研究工夫;再加上要面对普通读者,又需有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能力。因此,这套丛书的编写,对著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一概略的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应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元典著作的整体性、全方位的历史价值,并具备驾驭这些成果及将其融为一体的能力;应具备将学术成果准确而不失生动活泼地进行阐述的语言文字能力。然而,在具体写作中,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每个作者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对

自己著作的立意、结构和行文,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和安排。因此,丛书的每一本著作,既是丛书整体中的一分子,又不失每位作者个人著作之特色。

本丛书的撰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工作。但为了使它能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我们对作者提出了思辨性与通俗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要求;并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文风上照顾普通读者的需求,对一些艰涩的引文尽可能加以译述,或直接译为白话文加以征引。

现在,这套丛书开始出版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当自身的使命感开始化作现实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然而,我不能不说,这套丛书所以能面世,真正对它做出了贡献的是每一位作者,而为其付出了代价的则是出版者。在当前到处都在谈论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出版社欣然承担这套很可能要赔钱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工作,表现了他们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以及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65年前,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然而,却处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一个社会全方位变革的时期,清理古代文化,弄清未来的方向,也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我们仍需要为祖国新文化的建设鸡鸣不已。愿我们的“元典文化丛书”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尽一点绵薄之力。

李振宏

1994年9月11日

目 录

序	冯天瑜(1)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5)
一 “五经之管钥”:《春秋》在儒家元典中 的地位	(1)
1.《春秋》释义	(1)
2.《春秋》的作者	(3)
3.《春秋》的内容、体例和“书法”	(11)
4.《春秋》在儒家元典中的地位	(15)
5.《春秋》“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	(19)
二 《春秋》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34)
1.《春秋》的政治文化理念	(34)
2.《春秋》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70)

三 《春秋》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及民族政策	(104)
1.《春秋》华夷之辨	(104)
2.《春秋》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及民族政策	(116)
四 《春秋》与近代变革	(137)
1.“春秋公羊学”的复兴——近代学风变迁的肇始	(137)
2.“以经术为治术”:道、咸之际的经世思潮	(162)
3.“三统”、“三世”说与康、梁维新变法思想	(188)
五 《春秋》与中国传统学术范式	(213)
1.历代“《春秋》学”述论	(213)
2.《春秋》与中国传统史学	(249)
3.“三传”经典阐释路向与中国传统学术范式	(258)
附录一 《春秋》全译	(274)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73)
后 记	(376)

一 “五经之管钥”：《春秋》 在儒家元典中的地位

1.《春秋》释义

将《春秋》作为史书的书名由来已久。据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不少诸侯国的编年史大都以“春秋”相称。如墨子就曾说，“吾见百国《春秋》”；《国语·晋语》记司马侯对晋悼公说，“羊舌肸习《春秋》”；《国语·楚语》记申叔时论教太子时说，“教之以《春秋》”；《战国策·燕策》记苏代说，“今臣逃而纷齐、赵，始可著于《春秋》”，又记乐毅说，“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管子·法法》说，“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由此可见，其时晋、楚、燕、齐、鲁诸国史书都有《春秋》之名。故《墨子·明鬼》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诸说。

《春秋》虽然为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史书的通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各国史书大都湮没散佚,只有鲁国编年史——《鲁春秋》仅存。于是到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春秋”便蜕演为鲁国编年史的专称。如《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与《鲁春秋》”;《公羊传·庄公七年》释“星陨如雨”条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这里说的所谓“不修《春秋》”,即指未经孔子删修的鲁国旧《春秋》。

《春秋》既演变为鲁国编年史的专称,这一名称便直接为孔子删修鲁国史书时所承袭。自从《春秋》传言为孔子所作,被拥上经典的宝座之后,后人在研究、阐释《春秋》经文的时候,也对《春秋》之名给予各种不同的解释。一些经学家尤其是今文经学家牵强附会,赋《春秋》之名以种种深意:“一、以为《春秋》当一王之法,其命名含有赏刑的意义,就是说‘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二、以为含有褒贬的意义,‘一褒一贬,若春若秋’。三、以为《春秋》成书时期的关系,‘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群经概论》)上述诸说显然是《春秋》“经学化”的产物,而从根本上忽略了作为编年体史书本身所应该具有的本来含义。因此,当晋人杜预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审视、研究《春秋》及《左传》时,才给《春秋》一个为后世所一致公认的确切诠释: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

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春秋左氏传序》）

后来徐彦为《春秋公羊传》作注疏时，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春秋公羊传疏》）

2.《春秋》的作者

关于《春秋》的作者，也是一个久争不休的话题。从战国时期孟子提出孔子作《春秋》，到民国前期钱玄同等人认为《春秋》与孔子无涉，二千多年来关于《春秋》作者的争论就围绕孔子是否作《春秋》而展开，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春秋》为孔子所作；一是《春秋》为孔子据鲁国旧史而刊削；一是孔子根本就没有创作或刊削过《春秋》。

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之说的是孟子。在《孟子》一书中，有两处提及孔子作《春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

在先秦典籍中,提到孔子与《春秋》有关系的还有《庄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矣。’”(《庄子·外篇·天运》)这里的“治《诗》……《春秋》六经”,不似《孟子》“孔子作《春秋》”意义明确,但也肯定了孔子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代史学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时,便直引孟子的这一观点: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不仅是司马迁,董仲舒、刘向、桓宽、王充等著名学者也一致对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予以认同。

如董仲舒说: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义焉!
(《汉书·董仲舒传》)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

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

刘向说：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说苑·君道》）

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历也。（《太平御览》卷一六引《洪范五行传》）

桓宽说：

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世之后，天下折中焉。”（《盐铁论·相刺》）

王充说：

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论衡·超奇篇》）

汉人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者，当然不止上述这些，在当时通行的一些讖纬类书中，类似说法比比皆是。如《春秋纬演孔图》、《春秋纬元命苞》、《春秋纬感精符》、《春秋握诚图》、《春秋纬说题辞》等，但这类书荒诞不经、推测之辞甚多，不足征信，兹不赘引。

分析上引各家说法，认为孔子作《春秋》，主要有二点：一是鲁国旧史只是孔子作《春秋》的素材，其体例乃孔子所创；二